



处州摩崖石刻研究

徐文平 著

处州摩崖石刻研究

徐文平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处州摩崖石刻研究 / 徐文平著.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213-04367-3

I. ①处… II. ①徐… III. ①摩崖石刻—研究—丽水市 IV. ①K877.4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7890 号

-
- | | |
|------|---|
| 书 名 | 处州摩崖石刻研究 |
| 作 者 | 徐文平 著 |
| 出版发行 |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
| 集团网址 |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http://www.zjcb.com |
| 责任编辑 | 陈 雨 |
| 责任校对 | 张彦能等 |
| 封面设计 | 厉 琳 |
| 电脑制版 | 杭州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杭州富阳正大彩印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10×1000毫米 1/16 |
| 印 张 | 22.5 |
| 字 数 | 40万 |
| 插 页 | 2 |
| 版 次 | 201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213-04367-3 |
| 定 价 | 58.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

主 任	赵洪祝			
副主任	夏宝龙	王国平	巴音朝鲁	李 强
	黄坤明	郑继伟	张 曦	
成 员	胡庆国	马林云	陈一新	胡 坚
	金兴盛	刘希平	钱巨炎	乐益民
	杨建新	钟桂松	陈 荣	林吕建
	郑仓元	童 健	胡祖光	梅新林
	许 江	邵占维	张金如	陈德荣
	孙文友	徐止平	孙建国	梁黎明
	张鸿铭	陈荣高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陈永发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养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

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序

赵洪祝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称“文物之邦”，从史前文化到古代文明，从近代变革到当代发展，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勤劳智慧的浙江人民历经千百年的传承与创新，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具有鲜明浙江特色、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思想内涵的地域文化，这是浙江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晶，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如何更好地使这一文化瑰宝为我们所用、为时代服务，既是历史传承给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使命。深入挖掘、整理、探究，不断丰富、发展、创新浙江地域文化，对于进一步充实浙江文化的内涵和拓展浙江文化的外延，进一步增强浙江文化的创新能力、整体实力、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发挥文化在促进浙江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浙江省委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早在1999年，浙江省委就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2000年，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5年，作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決定》，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地方文化研究项目之一。该工程旨在以浙江人文社会科学优势学科为基础，以浙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现实课题和浙江历史文化为研究重点，着重从“今、古、人、文”四个方面，梳理浙江文明的传承脉络，挖掘浙江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推出一批在研究浙江和宣传浙江方面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和良好社会效益的学术成果，培养一支拥有高水平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梯队，建设一批具有浙江特色的“当代浙江学术”品牌，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升浙江的文化软实力，为浙江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有利的





智力支持,为提升浙江文化影响力、丰富中华文化宝库作出贡献。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开展三年来,专家学者们潜心研究,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在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等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已设立10余个系列400余项研究课题,完成230项课题研究,出版200余部学术专著,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些阶段性成果,对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提供了新的支撑力和推动力。

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并坚持把建设先进文化作为推进创业创新的重要支撑。2008年6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对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浙江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行专题部署,制定实施了《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明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要任务是,在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的同时,继续深入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等“三大体系”,努力使我省文化发展水平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文化建设方面继续走在前列。

当前,浙江文化建设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也面对十分严峻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始终保持浙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更好地发挥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不断探索的重大新课题。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的思路、更得力的措施,大力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回答浙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努力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努力形成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的研究成果。继续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我们热切地期待有更多的优秀成果问世,以展示浙江文化的实力,增强浙江文化的竞争力,扩大浙江文化的影响力。

2008年9月10日于杭州

目 录

上部:处州摩崖石刻研究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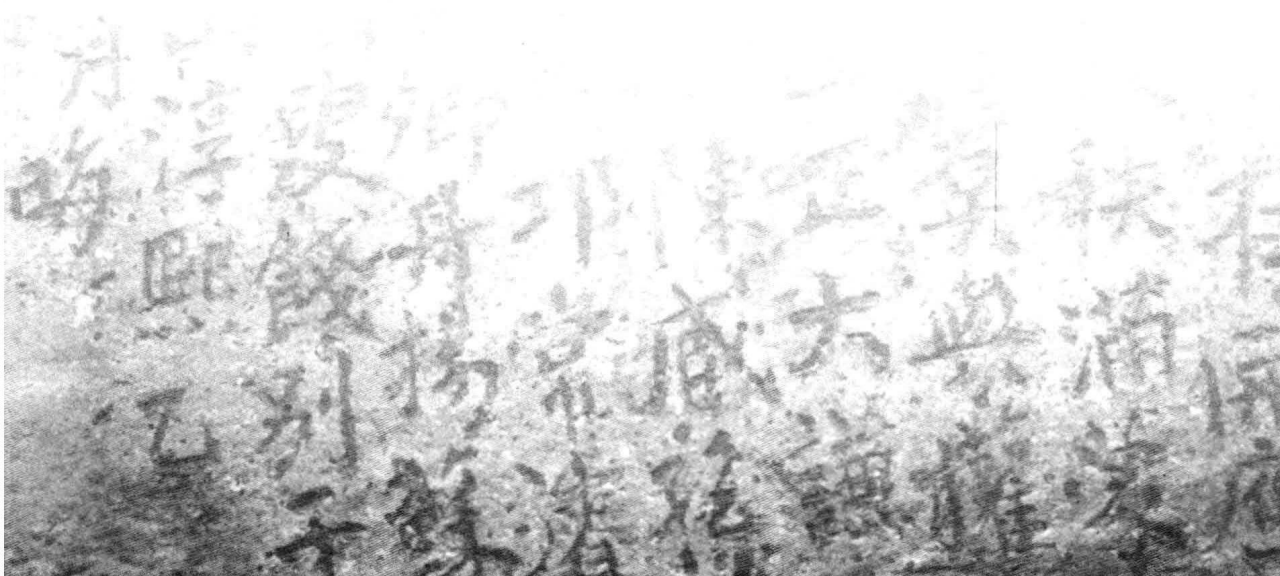
导论	3
第一章 处州摩崖石刻分类研究	11
第一节 史料类	11
第二节 宗教类	19
第三节 文学艺术类	23
第四节 科技及其他类	33
第二章 处州摩崖石刻专题研究	36
第一节 处州摩崖石刻与历代名人	36
第二节 处州摩崖石刻与书法艺术	72
第三节 处州摩崖石刻与水利文化	82
第四节 处州摩崖石刻与古代银矿开采	87
第三章 处州摩崖石刻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	91
第一节 处州摩崖石刻保护	91
第二节 处州摩崖石刻与旅游开发	94
附录	98
附一:处州摩崖石刻中新发现的处州历代官员简表	98
附二:处州摩崖石刻中的名词解释十例	99

下部:处州摩崖石刻图录篇

第一章 晋、南朝处州摩崖石刻	105
第二章 唐代处州摩崖石刻	110
第三章 宋代处州摩崖石刻	121
第四章 元代处州摩崖石刻	210
第五章 明代处州摩崖石刻	218
第六章 清代处州摩崖石刻	263
第七章 民国处州摩崖石刻	316
附录 待考处州摩崖石刻十例	342
后 记	350

上部：处州摩崖石刻

研究篇





导 论

冯云鹏《金石索·石索》曰：“古者，方曰碑，圆曰碣，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亦曰石刻。”〔1〕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国金石学概要》谓：“刻石之特立者谓之碣，天然者谓之摩崖。”〔2〕叶昌炽《语石》指出：“今人见题名，或称之为摩崖，不知摩崖不皆题名也。即桂林诸山，诗、赋、赞、颂姑无论，唐宋《平蛮》诸碑、韩云卿《舜庙碑》，非巍然巨制乎？……晋、豫、齐、鲁间佛经、造像，亦往往刻于崖壁……盖摩崖犹‘碑’也，为通称，为虚位，亦为刻石之纲，其文字则条目也。”〔3〕徐自强、吴梦麟《古代石刻通论》认为：“摩崖石刻是石刻中的一个类别。所谓摩崖石刻，就是利用天然的石壁以刻文记事的石刻。”〔4〕

总结前辈时贤对摩崖石刻的论述，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摩崖石刻是专指石刻文字，如马衡；一种认为包括石刻文字和造像，如叶昌炽。

笔者认为，摩崖石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摩崖石刻是指人们在天然的石壁上摩刻的所有内容，包括上面提及的各类文字石刻、石刻造像，还有一种特殊的石刻——岩画也可归入摩崖石刻。狭义的摩崖石刻则专指文字石刻，即利用天然的石壁以刻文记事的石刻。本书所考察的摩崖石刻仅限于摩崖文字石刻。

〔1〕 民国·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一集《一千种金石索一》。

〔2〕 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国金石学概要》，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7页。

〔3〕 叶昌炽撰、韩说校注：《语石校注》，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538页。

〔4〕 徐自强、吴梦麟：《古代石刻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



一、处州摩崖石刻遗存

处州、括州^{〔1〕}，皆今丽水市之旧称，地处浙西南，历来山水灵秀，自晋宋以降，名流徜徉其中，书题留刻，代不乏人。群星荟萃，五体纷呈。现存古代^{〔2〕}摩崖石刻 430 余处，无论数量与质量，堪称江南^{〔3〕}之冠，主要表现在：

1. 处州摩崖石刻中的南明山摩崖和石门洞摩崖分别是江南地区同一处年代跨度时间最长(约公元 330—1946 年)、单位刻勒密度最高(不到 1 平方米的石头上勒有 15 处题刻)的摩崖石刻群。

2. 处州摩崖石刻现存 430 处左右，约占浙江古代摩崖遗存的三分之一，江南古代摩崖遗存的五分之一。

3. 处州摩崖石刻的 70% 为国家级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比例之高为江南少见。

4. 江南地区摩崖石刻，只有处州摩崖石刻中的仙都摩崖题记是纯粹以摩崖石刻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4〕}

处州摩崖石刻有着十分丰富的历史、人文、科研、旅游和书法艺术价值，是浙西南文物最亮点之一，是浙西南文化深厚底蕴的代表。它始自晋、唐，

〔1〕 丽水历史悠久，是史前“好川文化”所在地。春秋战国时先属越国，越亡入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属闽中郡。东汉建安四年(199)，建松阳县，是为本境建县之始。隋朝开皇九年(589)建处州，十二年(592)改为括州，大业三年(607)改为永嘉郡，唐朝武德四年(621)复改为括州，天宝元年(742)改括州为缙云郡，乾元元年(758)改缙云郡为括州，大历十四年(779)又改为处州，郡治皆括苍(今丽水市莲都区)。括州再次改为处州后，处州名称一直沿用至清朝结束。

〔2〕 本书将公元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所有时代皆定为古代。所考察的全部摩崖亦限于古代。

〔3〕 江南的概念：一般认为，广义的江南即今天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上海及浙江全境、福建北部地区。大体上西达江苏镇江(吴淮文化边界)，东至上海(吴文化)，北抵江苏的通州地区(南通一部，吴楚文化边界)，南临福建南平(越闽文化边界)，这就是普遍意义上的“江南”。现在我们习惯把苏南和浙江称为“江南”。(《中国古代史常识·历史地理》)。

〔4〕 江南摩崖石刻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现在有 3 处，即焦山碑林(江苏省镇江市，南朝至清)、仙都摩崖题记(浙江省缙云县，唐至近代)、顾渚贡茶院遗址及摩崖(浙江省长兴县，唐至宋)。这 3 处只有仙都摩崖题记是纯粹以摩崖石刻作为国保的。焦山碑林号称“江南第一大碑林”、“书法之山”，其实它由碑刻和摩崖石刻两部分组成，摩崖石刻只有 200 处左右；长兴顾渚贡茶院遗址及摩崖作为国保，更看重的是唐代我国第一座皇家茶厂遗址——顾渚贡茶院，附属的摩崖石刻总共只有 9 处，少得很。退一步说，若将江西和福建北部也纳入江南范围，则江西省星子县的秀峰摩崖(唐至民国)，有 100 余处，最早的是宋代黄庭坚书刻的《七佛偈》诗，号称“江南书法艺术的宝库”；福建省福州市鼓山摩崖石刻(宋至近代)共计 558 处，数量超过处州，但疑刻高达 153 处，题刻最早的是宋庆历六年(1046)蔡襄等人的题名，远不如处州西晋葛洪“灵崇”题刻、南朝(423)谢灵运的诗刻和李阳冰“倪翁洞”题刻早，且福州不在福建北部范围，鼓山自号“东南碑林”，明示不属“江南”区域。



盛于两宋,至元、明、清不衰,主要分布在丽水市的莲都、青田、缙云、遂昌、松阳、庆元等区、县风景名胜区内 40 余座山崖之上。我们知道,古代刻石的书法遗迹,虽片石只字亦足珍贵,而如此大规模且保存完好的古代摩崖石刻,实为浙江乃至江南地区所罕见,毫无疑问,其在古代摩崖石刻遗存中,理应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浙西南境内多山川河流,交通不便,前人采录遽难遍及,除《括苍金石志》较完整地记载元代以前的处州摩崖石刻(明、清无记载)外,其他如《两浙金石记》等漏记甚多,且《括苍金石记》印数不多,流传范围不广,影响有限,学术界并未引起更多的关注,加上兵燹寇攘,风雨剥蚀,其中一部分损毁不存,一部分复为丛木苔藓所隐。尽管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浙江省人民政府、国务院逐步将南明山、石门洞、仙都等摩崖石刻分别定为省级、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加以保护,且随着文物普查的深入及旅游业的开发,有关部门还陆续新发现了一批古代(特别是明、清)摩崖石刻,但所有这些摩崖石刻,因种种原因,公开宣传介绍不多,故世人知之甚少,更谈不上专门研究了。

处州摩崖石刻主要分布在浙西南 40 余座山崖之中,其精华部分呈 C 形带状集中在丽水市区南明山—三岩寺、青田石门洞—太鹤山、缙云仙都三个著名的风景带内。其中南明山 58 处、三岩寺 32 处、石门洞 88 处、太鹤山 34 处、仙都 115 处(包括初旸山、仙水洞、鼎湖峰、小赤壁、赤城等地),几占已发现的处州摩崖石刻(晋至民国)的 70%。南明山摩崖石刻和石门洞摩崖石刻 1963 年就被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是全市摩崖石刻最早的省级文保单位;仙都摩崖石刻虽在 1989 年才被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后来居上,2001 年又被确定为全国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

市区南明山、三岩寺 90 余处的古代摩崖石刻,尤以宋刻集中称誉于两浙。南明山摩崖石刻的创作自东晋成帝中期(约 330—336)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历时 1600 多年,是江南地区年代跨度时间最长的摩崖石刻群,主要分列于石梁、高阳洞和云阁崖 3 处。石梁东西横亘,长二十余丈,腾空横卧,气势之雄伟远胜天台石梁,其上有“石梁”、“悬虹”、“仙桥”、“南明洞天”等古代摩崖,各体书法争奇斗艳,十分珍贵。清代诗人袁枚在游南明山诗中写有“数行元祐字,磨灭剩偏旁”,指的就是宋代元祐年间的处州知州关景晖等有字刻在石梁正中,后代人争刻其上,字被磨去了大半,甚为憾事,但却显出石梁题刻之难得。高阳洞有摩崖石刻 15 处,绝大部分为宋人遗墨,洞口崖壁下端即有无名氏刻写的《高阳洞纪事》:“大宋绍兴甲子、丙寅岁,洪水自溪暴涨,约高八丈,人多避于楼屋,误死者不可胜计,因纪于石,以告后来。”此题刻是极为珍贵的水文资料。它真实地记录了公元 1144 年和 1146 年两次洪水暴涨,给莲城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再如北宋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沈括



等人的题刻亦为稀有珍品。云阁崖石刻 12 处,其中东晋著名的道学家葛洪所题刻的“灵崇”二字,年代之早在江南仅次于绍兴跳山汉刻,《括苍金石志》谓其书法“飘若游云,矫若惊龙”,誉不为虚。“灵崇”边上有宋代大书豪米芾的“南明山”三个擘窠大字,字径 0.5 米,笔力遒劲,飞翥沉着,与晋代葛洪“灵崇”题刻一样是南明山最为名贵的摩崖石刻。米芾作为历史上杰出的书画大师,其片纸只字,人亦争相宝之,各地名山皆以拥有米字题刻而自豪。但据笔者所考,米芾摩崖真迹存世只有两处,一在镇江焦山,已模糊不清;再一就是丽水“南明山”大字摩崖,依然清晰,为永世瑰宝。新昌大佛寺还根据丽水米芾“南明山”真迹翻刻其壁。至于全国各地近 10 处号称米芾“第一山”题刻,皆为江苏盱眙“第一山”翻刻,且绝大部分翻刻为碑。(盱眙“第一山”摩崖真迹也早在明崇祯年间毁于战火,现在的盱眙“第一山”系清代重勒并改为碑。)与这两块名刻不可分割的是北宋处州郡守刘泾分别题刻在它们边上的两段书赞。刘泾,字巨济,四川简州人,历任国子监丞、太学博士、职方郎中,宋绍圣时任处州知州,“与米芾、薛绍彭书画情好,三人所收晋唐书画真迹最多,每得一卷辄以书札往来,诗篇唱和,互相品定,世称米薛刘,名振一时”^{〔1〕},工书善画,对金石深有研究,编有《成都刻石总目》三帙。刘泾的两段摩崖书赞是“灵崇”与“南明山”作为真迹的最直接、最有力的佐证。

以幽暗清闲名列道光丽水八景的三岩寺,唐宋以来摩崖遍布其间。其中前述北宋刘泾就曾留有诗刻、游览题记各一段。刘泾的诗刻今已不存,他的游览题记与唐括州刺史李邕的“雨崖”题名,抗战时被日寇的飞机炸断后倒入三岩瀑布之前的潭中,上世纪 60 年代,丽水文物部门花了极大人力物力将它们整理出来,列于白云洞前供人观赏。李邕作为书法史上与王羲之并称的唐代最杰出的书法家之一,素有“括州象比右军龙”之誉(清王文治诗),两度任职括州,其留下的“雨崖”石刻在三岩寺诸刻中时代最早,价值最高,弥为珍贵。

石门洞摩崖石刻是江南地区单位刻勒密度最高的摩崖刻石群,月洞石床侧不到 1 平方米的石头上勒有 15 处题刻。石门洞摩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多彩,有着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这里有南朝以来谢灵运、沈括、阮元等历代名人墨客留下的摩崖 88 处(不计洞口路基下被埋数处)。其中摩崖石刻分布在石门洞旗鼓两山有 25 处;瀑布龙潭左边的月洞 63 处。其形式有题名、诗刻、题记,书体篆、隶、行、草、楷兼备,内容主要为赞美石门飞瀑的壮观与石门洞天的幽奇,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石门洞摩崖石刻时间跨度长达 1500 多年,亦为江南罕见。从公元 423 年南朝谢灵运的诗刻《石门新

〔1〕《括苍金石志》云舛跋语。



营》及《石门最高顶》开始,唐朝有公元733年徐峤《游石门山》诗刻、749年郭密之《石门山》诗刻等4处。宋朝有公元1039年叶清臣题记、1073年沈括题记、1126年祝公明题记、1156年虞似平题记等31处。元朝有公元1327年郑原善《观石门瀑》诗刻、曹用题记等6处。明朝有公元1525年王俸题记等2处。清朝有公元1797年阮元题记、1868年徐树铭诗刻等13处。民国公元1934年鲁涤平题名等6处。南朝谢灵运的诗刻《石门新营》及《石门最高顶》是谢灵运在景平二年(424)首游青田石门洞所作,这也成了石门洞为世人所知的最早文字记载。位于洞口旗峰处的“石门洞”悬崖题刻,是离地最高和字径最大的石门洞摩崖石刻,离地10余米,字径一米多,横贯绝壁,气势雄伟壮观。

太鹤山摩崖石刻主要勒于混元峰南面岩壁及其周边,有自宋至清代的摩崖题记15处,有题名、题诗和人物刻像三类,书法五体皆俱。最具特色的是刻立在混元峰东南面岩壁的明天启三年(1623)郑奎光刻勒的摩崖造像。像高约3.8米,宽1.6米,有“闽弟子郑奎光书”款,如此庞大的刻像为江南仅见。

仙都摩崖石刻有115处之多,主要分布于倪翁洞、仙水洞、小赤壁等处。倪翁洞留有唐、宋、明、清、民国的文人摩崖石刻60多处,是仙都摩崖石刻最集中的地方和精华部分。其中初阳山上倪翁洞中的“倪翁洞”三个篆字摩崖是由时任缙云县令、李白族叔李阳冰所题,最负盛名。李阳冰是唐代小篆书法大家,《宣和书谱》称:“方时颜真卿以书名世,真卿书碑,必得阳冰题其额,欲以擅连璧之美,盖其篆法妙天下如此。议者以‘虫蚀鸟迹’语其形,‘风行雨集’语其势,‘太阿龙泉’语其利,‘嵩高华岳’语其峻,实不为过论,有唐三百年以篆称者,惟阳冰独步。”^{〔1〕}李阳冰所书碑版,据史籍著录,可见者65通。宋时存世尚多,元明后大都亡失。虽经重刻,亦多见失真,且盛名之下,必多伪托。李阳冰在缙云的篆书真迹“倪翁洞”,字径45厘米,幅大50厘米×170厘米,保存完好,属稀世之品,珍贵文物。仙水洞摩崖石刻群的思想性、艺术性亦相当高。它分布于仙水洞中、鼎湖峰上、步虚山下,共有40多处。其中,北宋学者沈括和文学家李之仪题记最为可宝。仙都摩崖石刻留题名家还有宋代叶清臣、王廷老、留元刚、郭磊卿、赵立夫,明代樊献科、龚勉、郝敬、常居敬、李鋈,清代谷应泰,民国何遂、楼邨、曾养甫等。

〔1〕《宣和书谱》,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12页。